

现代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从“类型”到“分波次”

王子夔

摘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使得1980年代以降关注整体社会变迁的比较现代化研究转入沉寂。这一变化也与早年现代化研究选择的比较对象集中于改革成功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削弱了解释的有效性有关。系统地梳理1950年代以来现代化研究的进展,可以注意到既往笼统地考察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现代化,在划分类别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方法局限明显。晚近各学科在比较研究中强调国家类型、时代趋势、国际环境变迁及推行改革时机等因素的综合作用,重视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探究各国现代化成败。因此,结合“时间”与“空间”因素,通过对现代化的波次划分,结合实证研究,选择共时性和同类型的比较对象,形成更有效的机制性解释,成为当下推动现代化研究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 现代化 类型 分波次 现代国家转型

作者王子夔,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03-0177-08

一、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退潮

当清王朝在1840年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卷入世界体系之后,国际竞争带来的军事压力使得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成为理解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对这些主动或被动改革努力得失的评析,不但关系到如何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走向,同样直至当下仍与中国的现实发生着若隐若现的联系,乃至有通俗史家喻之为“历史的三峡”。

因此,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为时代的主题,在比较的视野下定位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与歧路成为学界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①罗荣渠、景跃进、张静等学者从译介英语世界比较现代化研究开始,借助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当时流行的批判理论,探讨了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②汪熙、章开

^①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译者絮语”第i页。

^②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特别是第409—430页。此外,这一时期的现代化研究热潮还表现在历史学、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相关著述的译介和出版。

沅、钱乘旦、杨豫、陈祖洲等学者也有从国别研究出发讨论现代化进程的著述出版。^①

在现代化研究译介方面，早在 1984 年，现代化研究奠基人之一的西里尔·布莱克（Cyril E. Black）主持撰写的《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就由老一代新闻—政策工作者组织翻译并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随后，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全面译介了从经典理论到学术前沿的现代化著述，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陆续出版。^②其中，西方 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出版的西里尔·布莱克、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等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是这一时期译介的重点之一。^③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充分注意到现代化理论的进展，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理论成为译介的另一个重点。在对西方现代化研究的译介中，罗荣渠的工作最为系统和深入。他主编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编选译介了一系列这一时期现代化的前沿著述，议题涉及早年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理论、政治现代化进程、东亚发展模式等。^④他也是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最早的中文版译者。^⑤

落实到现代化研究，从中国问题出发，政治现代化和工业化道路是这一代学人关注的核心。在史学理论的发展上，通过批判地继承经典和前沿现代化理论，修正早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强调的“一元单线”历史发展论，提出“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⑥在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研究中，追随当时发展理论的前沿，从发展理论和依附理论的视角考察从 1840 年至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变迁和得失。在比较的视野下，通过对各国现代化经验的梳理，并将其与中国经验相比附，讨论现代化的条件和机遇等问题。这一时期的比较现代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与作为“理想形态”的英美等先发现代化国家相比，关注先发与追赶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与文化背景及现代起点接近的东亚各国 19 世纪现代化进程的开端、20 世纪 70 年代现代化建设“东亚模式”之间的比较研究。^⑦

在这一时期以中国为主题的现代化研究中，无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还是追随回应现代化理论前沿、回应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虽然没有明确的比较对象，事实上仍是将一个理想的西方作为 19 世纪中国的参照物。同样，“东亚模式”则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参照物之一。这一视角下的比较虽然有助于我们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理解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正如后发现代化和依附理论强调的，现代化开端和进程的先后顺序及其利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结果。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在选择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同时，也忽视了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对政治现代化的类型划分和经济现代化“起飞条件”的讨论，由此忽视了关于“历史时间”的讨论。

其实，在大陆兴起现代化研究热潮之前，台湾学界已经走过了类似的道路，“中研院”近史所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推行庞大“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计划，并在前期派遣学者去美国进修，翻译西方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著作。这一计划持续近二十年，虽未能最终完成对中国所有省份的现代化研究，但先后出版了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五册，^⑧各书研究的时段与体例保持一致，先描述该地区原来的地理、经

① 关于当代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综述可参读林被甸、董正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钱乘旦：《现代化研究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此文为纪念罗荣渠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作》，《世界历史》2006 年第 6 期。

② 西里尔·布莱克主编：《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周师铭、胡国成、沈伯根、沈丙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

③ 罗荣渠：《编者的话》，罗荣渠主编、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年，前言第 2 页。这一时期译介的现代化研究著作还有 S. N.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西里尔·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年，等。

④ 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前言部分第 3—6 页。

⑤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 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罗荣渠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

⑥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增订版），第 56—86 页。

⑦ 当然同时代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亦大体遵循同样的研究取径，参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

⑧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近史所专刊，1981 年；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近史所专刊，1982 年；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近史所专刊，1982 年；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近史所专刊，1983 年；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近史所专刊，1984 年。

济、社会状况，再论外力冲击与影响，进而将现代化分解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要素分章加以论列，其理论预设是西方的冲击带来了现代化，因此不难理解完成的几册都集中在沿江沿海的发达地区。该计划至1990年结束。^①之后台湾史学受西方史学研究中文化史转向的影响，新史学的浪潮兴起，关注“人”在场的历史，现代化这类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的议题日渐式微。^②

同样，大陆学界随着十余年来研究范式的转变，有关整体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渐次落幕，历史中具象的地方、利益集团和个人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这一波现代化研究，无论是译介和著述，史观都与早年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相似，多少有将中国放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的对立面上，将近代中国视为有待唤醒的落后僵化国家。在新的学术浪潮的冲击下，到21世纪初，比较现代化研究在年轻一代历史学人中逐渐失去了回响。^③

在罗荣渠去世二十年后，重新思考这份学术遗产，我们在肯定他和这一代学人主持的事业所取得业绩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囿于当时学习和赶超的立场，学者对于西方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理论的运用相对刻板，导致在选择比较对象时相对随意。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将先发现代化国家作为先进而稳定的客体来取法；同时笼统地将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现代化加以比较。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路径只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狭义讨论现代化等因素，都削弱了比较研究得出解释的有效性精确性。这或许是国内现代化研究退潮的重要原因。因此，重新梳理现代化研究的文献仍有必要。一方面在同既有研究的对话中发现进一步推进研究的切入点；另一方面通过选择更为得当的比较对象，更好地解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得与失。

二、从“类型”“因素”到“分波次”：现代化研究的变迁与进展

回到现代化进程本身，15—18世纪的第一波现代化成就了“西方世界的兴起”。18—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化变迁，则在涉及领域、影响群体和政权范围等方面逐渐扩散和深化。^④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殖民帝国的收缩，前殖民地建立纷纷独立，建立民族国家，效仿先前的现代化经验、运用社会工程学的逻辑进行国家建设“制造现代化”，则成为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核心议程之一。

在第一波现代化和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之间，18—20世纪上半叶对的变迁无疑格外值得关注。首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开端，进程曲折。其次，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和现代化进程本身的变迁，使得各个国家面临的外力冲击与先发现代化国家差异显著。研究者有必要通过对时间维度的进一步划分，更好地认识和解说此间变迁的压力和动力。再次，除最早开始现代化并取得成功的英国之外，此后无论是“西方世界的兴起”过程中历程曲折的荷兰、西班牙和法国，还是较晚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各国，效仿先发现代化国家，都成为改革者和大多数革命者提出和推行政策的依据。甚至可以说，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改革者和先发现代化国家的代言人按照“社会工程学”的逻辑“制造现代化”国家的做法，是此前各时期现代化进程中大国干涉和改革派决策者效仿先进的做法在时间维度上的延伸。然而，相当一部分从社会工程学立场出发的现代化改革和建设最终遭到了失败。^⑤最后，这一时期启蒙观念和现代化改革在培育民众的现代性和公民社会、直接推动了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成为人们关注现代化问题的直接动力。^⑥到20世纪初，“现代化”开

① 这一计划以1990年召开的以现代化为主题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作为句点，会议论文集于1991年出版，《中国现代化论文集》，“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

② 王晴佳：《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3—174页。

③ 例如早年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后由南开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编《现代化研究》辑刊也在2009年第五辑出版之后停刊。

④ 到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尾声，除社会经济变迁推动的制度变革之外，受启蒙观念影响，其他各领域培育现代公民和的市民社会的一系列改革成为政策。如果说世俗化和教育的发展是对此前中世纪晚期开始进程的推进；那么工业化则是现代化进程从这个时代全新，并逐渐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和新趋势。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现代化进程从西欧的英国、荷兰、西班牙和法国，逐渐扩散到中东欧的普鲁士、奥地利、俄国等。

⑤ 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

⑥ 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序言第III页。

始有意识地成为政策调研和学术研究的目标，政治家和学者的认识和理解也逐渐深入。

研究者关注现代化问题的起点大约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经济学者对农业和工业化问题的关注。张培刚 (Pei-Kang Chang) 通过对英、美两个先发现代化国家以及末章对中国案例的探讨，在理论建模和实证研究两方面“系统讨论了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提出农业国或者经济落后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和发展，必须全面推行工业化。^①

经济和政治发展成为战后现代化的两个核心问题，经济理论和经济史学者成为现代化研究最初的主力。如果说作为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的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 和后发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Alexander Gerschenkron) 的影响力主要在学界，那么沃尔特·罗斯托 (Walt Whitman Rostow) 有关经济起飞的理论则直接影响了美国对战后新兴现代化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实践，直接或间接地干涉了他们国家构建的过程。

研究者对“现代化问题”政治维度的关注同样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一时期，一方面 20 世纪初终结的多民族帝国，在国内社会革命和国家间战争中完成了现代国家转型。新政权开始新一波现代化改革和建设进程。另一方面，新近独立的前殖民地和终结帝制的国家也全面开始了国家建设进程。以美国为主的英语世界研究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研究的主力。建立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运用类型学的方法比较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变革，提出现代化的宏观理论是这一时期学者的共识。西里尔·布莱克、戴维·阿普特 (David E. Apter) 等政治和历史学者从对现代化的定义和分类出发的研究，关注各国从建立现代政治制度改革开始的现代化进程，讨论了影响各国现代化路径变迁和结果的各类因素。在类型化的基础上，从比较现代化的角度讨论了他们的异同。布莱克在数十年后主编《比较现代化》论文集和主持撰写的《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就是按照——考察和比较分析各维度因素的形式进行的。这一模式也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学者现代化研究的起点。^② 布莱克的研究也影响了社会学早期的研究。他们进一步关注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行为体及其行动，推进了对现代化变迁的解释。S. N. 艾森斯塔德 (S. N. Eisenstadt) 则弱化国家之间的差异，转而以社会群体为关注点，梳理了各类行为体对现代化变迁的认识和行动，强调了此间“抗拒与变迁”的互动。^③

历史社会学者对“现代化问题”的关注最初落在“现代国家转型”上。对转型进程中行为体和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变革结果的解释仍然建立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框架上。巴林顿·摩尔 (Barrington Moore Jr.) 早年通过对阶级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现代国家转型的研究，解释了资产阶级发达程度影响现代国家转型道路选择。这一研究虽然远非全面，但在当下看来仍然是最关键的因果关系之一。^④ 西达·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 则进一步聚焦革命本身，从原因和结果讨论了分属不同维度、影响变革不同阶段的君主/支配阶级、农业经济和国际压力等三方面原因如何引发了社会革命，进而影响了现代国家转型路线和结果。虽然斯考切波从因变量出发选择案例的做法，在解释统治阶级经济依赖程度和权力分配如何影响精英一致或分裂，以及乡村自治程度如何影响社会革命的发生时，分别选择了她认为最合适的反面案例。然而，全然不同的反面案例使得斯考切波致力提出的解释链严格来说成为两个并列的子项目，从而严重削弱了此项研究对国际竞争如何影响社会革命的解释力。而且，斯考切波对各项解释因素的赋值，和由此对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的讨论同样值得商榷。但是这项早期的研究及其解释框架仍然是现代国家转型研究重要的里程碑。^⑤

① 张培刚口述、谭慧整理：《〈农业与工业化〉的来龙去脉》，张培刚：《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Industrialized》，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中文引言第 F15，F51 页。

②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戴维·E. 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西里尔·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西里尔·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

③ S. N.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

④ 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1962），王茁、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⑤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1979），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对斯考切波此项研究的批评参见 Barbra Geddes, *Paradigm and Sand Castle: Theory Building and Research Desig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pp. 106—117。

查尔斯·蒂利 20 世纪 70 年代关于欧洲国家构建和政治转型的讨论是历史社会学关注现代国家转型问题的萌芽。^① 此后 1980 年代“找回国家”的转向和趋势，进一步推动有关现代国家转型研究的同时，也成为作为现代化问题的国家建设研究由政策领域进入学术领域的开端。埃文斯、鲁施迈耶和斯考切波（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Skocpol）主编的论文集《找回国家》是这一转向最初的里程碑。严格而言，文集中与现代化研究直接相关的研究只有国家如何影响经济转型和社会再分配、国家与阶级形成等章节。^② 但从对社会变迁中将国家这个行为体同掌握国家权力的君主或政府分开衡量、解释的方法，从两个方面推进了研究者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一是形成了对现代化研究中行为体的共识，注意到影响现代化进程和转型的不仅是阶级利益集团，还包括了国家本身；二是通过国家构建这一议程，将现代化趋势中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转型等整合在统一的框架下，成为现代国家转型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③

然而，回顾这一时期的现代化研究我们注意到，各个时期的现代化进程差异之大，并不适合笼统地放在一起考察和解释。而且对现代化起步时间和国家类型不加区分便通盘比较的做法，除了比照要素的有无、发生的先后之外，对解释现代化得失成败助益有限。既有研究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根据一些经典法则进行了分类讨论。^④ 布莱克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有关现代化的宏观解释，随后在比较史研究中通过进一步区分不同因素组合形成的政治现代化类型，从而通过“关注变化和动力”，解释不同国家现代化差异的“原因和功能”。布莱克强调的几个观点都影响至今，例如将国家“政治性组织和社会”作为分析基础的界定、“现代化是一个过程”的论述以及强调必须重视变迁因素等。然而，布莱克“系统概括”15 世纪开始现代化的目标，湮没了其对“时间关系”和“比较实体的界定”的强调。^⑤

同样，经济学者在考察经济发展这一现代化核心进程时，通过在时序（sequence）上对进程各阶段的划分，形成了“经济增长的五个阶段”的解释框架，^⑥ 尤其是对变迁开端“起飞的前提条件”的讨论，从经济维度强调了现代化开端的“准入门槛”，即选择比较对象的条件。^⑦ 而罗斯托 20 世纪 90 年写作的第三版序言对发展等级（graduating classes）的划分和讨论，对自己早年理论框架进行了反思和改进，可以说是分阶段、分波次地讨论现代化进程的滥觞。^⑧ 由于罗斯托 1959 年初版著述的目标仍然是解释经济增长的通则，继而对第三波现代化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工程”提出具体政策建议，而且罗斯托三十年后理论修正的影响力远逊于早年理论的影响，导致了从自变量诸因素解释构成“初始条件的差异导致经济发展结果不同”，至今仍然是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的主流思路，时间维度的因素仍然是附属于其他因素而存在的。

回到现代化理论本身，其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退潮是宏观的现代化理论自身遇到瓶颈后的转向。不过“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东方世界的停滞”仍然是各领域学者关注的焦点，现代化进程本身也仍然是各学科研究的热点。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经济学、经济史、历史学、（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重新整合，既成为传统现代化研究的终点，也促进了有关现代世界形成、现代国家转型、国家建设等议题的研究。受同期学术思潮影响，在宏观的现代化理论整体淡出的同时，比较方法和构建中层理论成为在沃勒斯坦之后主要的方法和路径。

这一时期专题史和世界近现代研究突出了现代化的主线。在专题史方面，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① 汉斯·约阿斯、沃尔夫冈·克内布尔：《战争与社会思想：霍布斯以降》，张志超译，李钧鹏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30—231 页。

② 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编著：《找回国家》（1985），方力维、莫宜端、黄琪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

③ 社会学对现代化问题研究涉及上述代表性著述的系统讨论还可以参见约阿斯、克内布尔：《战争与社会思想》，第 227—250 页。

④ 逻辑学中，约翰·密尔（John S. Mill）关于案例选择和因果推论的“密尔五法”是比较研究援引和依据的经典研究方法。这其中，基本的求同法（method of agreement）和求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是几乎所有研究者讨论的起点。

⑤ 参见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 30—48、87—115 页；尤其第 31、34—35、40—41、87—94、97—115 页。

⑥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三版序言，序言第 14—43 页，及正文第 4—35 页等。

⑦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第 17—18、31—35 页。

⑧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序言第 20—25 页，尤其第 23 页“序图 1”。

McNeill)对技术与军事变革如何影响社会变迁的研究,从作为现代化动力的军事压力和改革核心目标之一的“强军”,做出了解释。^①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其《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中对社会权力四大来源的理论探讨,和第二、三两卷中新兴阶级的兴起与整合、民族主义的兴起、帝国转型等议题合流,形成了我们解释19世纪中期以降“国家能力”和宏观时代趋势如何影响国家回应“现代化问题”的路线图。^②塞缪尔·芬纳(Samuel E. Finer)在《统治史》中对现代国家转型,尤其是欧洲君主专制国家的现代国家转型和工业化的讨论,隐含了对现代化的维度、现代化的宏观趋势对国家的影响、现代化与现代国家转型关系等“现代化问题”的解释。^③此外,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以现代化为主线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从“漫长的19世纪”自身的特征出发,全景拼图的叙事,则成“现代化问题”从全球史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时空语境、时代趋势和它们的定位。^④

三、分波次基础上的比较现代化研究

直至晚近,学者在讨论中国近代历史的背后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个作为“理想形态”存在的西方。但是从现代化的系谱来看,“成功”即使不是孤例,也是经历了多轮改革和几波曲折的进程才得以实现。而且,西欧国家无论在广义的现代化进程,还是以政治制度变迁为核心的现代国家转型问题上,都与东欧和亚洲国家在“历史时间”上,存在显著的差异。^⑤因此,前辈学人在经典现代化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影响下考察中国经验与西方经验的差距和分岔的研究,虽然兼具宏大视野和中国情怀,也深入讨论了后发现代化的时机和“中国中心”观念对制度性变革的制约;但是同先发现代化国家理想模型的对照式比较,因为时空语境诸多因素的差异,对于定位和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演进启迪有限。^⑥以先发现代化国家经验比较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改革,虽然可以说明经济落后、观念保守、国际竞争激烈制约了清帝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很难说明这些制约因素之间影响的差异。哪些因素的确是时运不济的偶然,哪些因素实为本质的不足,它们如何影响了中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既往研究并没有详细展开。同样,无论是先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其他多民族帝国同侪,对他们现代化进程的讨论通常也是从因素出发,而很少讨论改革的时机和进程本身对现代化结果的影响。

因此,尽管比较视角下的宏大研究在当下研究潮流下显得格格不入,^⑦但比较现代化研究本身仍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学者提出在比较的视野下观照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道路,反思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路径的研究观照,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通过呼应中层理论的转向,由此厘清现代化和现代国家转型的系谱,我们可以选择更为得当的比较对象。同时,通过与政体和国家架构更加相近,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也相似国家的比较,对进一步揭示演进路径,梳理其中的得失,解释改革失败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综观早年现代化经典理论未竞的目标,及晚近中层理论对“现代化问题”的回应,分波次地讨论现代化进程不仅是历史时间本身的属性决定的,也是现代化进程在时间维度上的展开决定的。在廓清时间范围(scope condition)及其时代趋势、根据可能性法则(possibility rule)综合考虑政体、国家属性、面临的现代化问题等特征,选择比较对象进行比较现代化研究。不仅可以更深入地讨论初始条件对现代化的影响,而且

① 威廉·麦克尼尔:《角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倪大昕、杨润殷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②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从开端到1760年的历史》,刘北城、李少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陈海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全球诸帝国与革命(1890—1945)》,郭台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③ 塞缪尔·芬纳:《统治史(第三卷):早期现代政府和西方的突破——从民族国家到工业革命》,马百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④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三卷本,强朝辉、刘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⑤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

⑥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修订版),第56—119、249—313页。

⑦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研究日益精细化的同时,以王国斌、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在比较视野对早期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情况的重新定位,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有“资本主义萌芽论”复生的意味,但已经将比较重新纳入到历史学研究的范畴之内。

可以更准确地解说其中因素、相互关系等的异同如何影响了进程和结果。^①当下在各学科的推动下,“现代化是分几波实现”已经逐渐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也有越来越多越多的学者在讨论中强调“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也是分几波实现”。^②回顾晚近的研究进展,重新梳理现代化的系谱,有助于我们更合理地选择比较现代化研究对象,更好地追溯和解说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变迁。

第一波现代化包括了英国、西班牙、荷兰、法国四个国家,第三波现代化主要包括二战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学者的共识。而对于18—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上承早年经典研究的线索,晚近在理论上重新整合的比较研究认为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时间和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条件是现代化波次划分的基本标准。其次,各个国家在时代趋势和现代化的系谱两个层面上开始变革的时机、现代化传播路线上的空间位置的不同,进一步决定了中观层面的“半”波现代化的顺序。再次,国家的政体类型等属性进一步决定了现代化系谱上,哪些国家适合作为比较对象,以及某一波次的现代化的全部案例有哪些。在18世纪,法国、西班牙和从这一时期开始现代化改革的普鲁士、奥地利是第一波半现代化的核心国家。^③广义而言,俄国也应位列其中。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也是第一波半现代化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国际竞争、军事压力和启蒙观念的影响下,开始效仿先发国家或者改革成功的同侪制定改革决策、进行国家建设。

到了19世纪,经济领域工业化的起步和政治领域民族主义观念兴起两大宏观趋势使得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条件、决策和实践都区别于前一波现代化,因而即使对于同一国家、同一政权的现代化进程也应当分开讨论。这其中,19世纪中期再次开始现代化改革的俄国和奥地利帝国,同这一时期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奥斯曼帝国和清帝国同为多民族官僚帝国。它们广袤的地域、复杂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族群利益集团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影响,都有别于这一时期其他开始和推进现代化的国家。19世纪中期开始,它们在国际竞争和军事压力引发的财政危机触动下由改革开启的现代化进程,构成了系谱上第二波半现代化国家。相对有早有晚开始现代化改革的其他南美洲和亚洲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和日本则大致列入第二波现代化国家的范畴。这一时期国家统一和现代化进程相辅相成的德国和意大利也属于后一范畴。

因此,既往对清帝国现代化改革的讨论中,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与中国文化相近、互动密切的日本视为天然比较对象的方式值得商榷。^④毫无疑问,中日两国的竞逐与冲突是构成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线索之一。但是无论从国家形态论,还是从漫长的衰落和曲折的改革进程论,清与奥斯曼帝国同为多民族帝国有很强的同构性。作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尽管早在梁启超等人笔下便被视为中国当引以为镜鉴的对象,但至今很少有学者将其19世纪至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与晚清的现代化改革作比较研究。^⑤如果我们回到中国近代史研究内部,不难注意到随着近年来世界史领域中出现“全球史转向”,帝国及帝国间的碰撞互动再次成为史学研究的主角。受此影响,近年来海外新清史研究中,对清王朝“帝国”形象的重绘,特别对其边疆拓展与治理的讨论,成为一个重要的着力点。^⑥同时,晚清以降“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以及使得

① 对比较研究中负面案例选择和广义比较案例选择的讨论参见 James Mahoney and Gary Goertz: “The Possibility Principle: Choosing Negative Cas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s Review*, Vol. 98, No. 4 (2004), pp. 657—622.

② 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现代化:一个“因素+机制”的新解释》,《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第119—137页,尤其第119—120页。

③ 参见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现代化:一个“因素+机制”的新解释》,《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黄昏”——法国与西班牙的改革之殇》,《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叶成城:《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胎动”——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崛起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

④ 这一“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晚清政治活动家和改革派政治家经常以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比照中国存在的问题,以此推动相关的讨论、谏言和动员。这些讨论和检验包括了通过财政改革和军事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目标,及通过推进工业化和政治改革实现现代国家转型。1980年代比较现代化研究的关注点同样在东亚国家之间。参见罗荣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现代化新论》(修订版),第451—484页,尤其第451—462页。

⑤ 国内发表的著述中仅有少数简单的比较讨论,例如高冰冰、丁伟:《近代中国与晚期的奥斯曼帝国之比较》,《天府新论》2004年第6期。相对深入的比较讨论反而见于一些关于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研究的译者序、对土耳其民族主义变迁著述中研究意义的讨论等。

⑥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研究路径的生成并不在于中国研究的内部,更多是回应西方学界对帝国研究的新思考,在其时性的架构中比较清帝国与其他帝国的形成及互动。相关的综述可参读程秀金:《“新清史”清朝统治模式之述评——以清朝平定和管辖新疆为中心》,《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

清政府卷入中法、中日两场战争的越南与朝鲜问题，都与如何维护旧日帝国的边疆与宗藩体系有关。如何在多民族帝国现代化转型的范畴内，重新定位晚清的一系列改革及内外政策的得失，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反之，在近代日本，边疆问题和旧有国际体系的负担从未制约现代化改革，族群政治问题也不曾影响国家政治。封建制度、幕府统治激励了皇权旁落对君主改革的意愿。对于日本皇室来说，同新兴商业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加强中央集权与推进现代化相辅相成。^①与此相似，布莱克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主持的关于 19 世纪俄国和日本现代化的比较研究项目，固然与美国现代化研究对盟友日本和对手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关注相关。然而这一项目本身作为比较史研究，比较对象并非最优的选择。^②两个国家除了这一轮现代化开端的时间点接近，也都从社会制度入手，其他无论是最基本的国家形态、改革进程的差异，还是其他影响因素例如族群政治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局限了比较研究的意义。

同样，正如上文对分波次现代化的讨论，研究者通常将俄国和奥地利帝国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初的一系列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作为整体来讨论的做法同样值得商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分波次实现”，不仅针对早期现代化失败的国家，也适用于早期现代化取得部分成功的国家。奥地利和俄国 18 世纪的现代化改革虽然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一方面，两个国家这一时期改革未能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固化，继而影响和约束了它们之后改革的进程。另一方面，到 19 世纪中期重启改革时，两个国家无论是绝对主义统治结构和国内利益集团力量对比，还是所处的欧洲国际体系，都与 18 世纪改革之初有很大的区别。更不用说到 19 世纪中期，工业化成为经济现代化的核心、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核心的时代趋势，使得这一时期作为多民族帝国的俄国和奥地利帝国在现代化的动力、影响因素和阻力都与 18 世纪时完全不同。对各国现代化进程分波次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给出更准确的解说，也有助于我们提出更具建设性的比较历史研究。

总之，回到时空语境本身，分波次地考察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回应经典现代化理论从因素出发提出的现代化类型的解释，更好地整合数十年间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和分领域、分国别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我们更好地通过国别和比较历史研究，理解这一从现代早期以来，至今仍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历史社会进程。

（责任编辑：周奇）

① 西里尔·布莱克主编：《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

② 西里尔·布莱克主编：《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出版说明”。

Rethinking Modernization Studies

—— From Types to Waves

Wang Zikui

Abstract: With the transi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es on 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 with a focus on general social transition came to a silence after the 1980s boom. This transition is largely related to case-selection-bias of modernization studies in the early years. The past researches usually select successful states and regions as the comparative cases to Chinese experience, thus weakened effectiveness of explanation. Wit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odernization studies from the 1950s, we can find that a mixed discussion of moderniz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and developmental stages have obvious limitation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our time usually highlights comprehensive roles of state type, trends of the times,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opportunity of reforms in studying modernization. By concerning facts of both time and space, as well as identifying waves of modernization, the selection of synchronic cases of the same type would form effective and mechanical explanations, and thus promote modernization studies of the time.

Key word: modernization, type, wave, modern state transition